

战后

新版

日本外交史

(1945—2005)

〔日〕五百旗头真 主编
吴 万 虹 译



如果从某一特定的时点来看，历史的瞬间总像是“没有海图的航行”一般。

战后日本是怎样航行在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期的国际社会的呢？

本书再现了战后60年日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的外交选择。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Postwar Japan



世界知识出版社

新版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2005)

[日] 五百旗头真 主编

吴 万 虹 译

世界出版社

SENGO NIHON GAIKOSHI 2nd edition by IOKIBE Makoto

Copyright © 1999, 2006 by IOKIBE Mako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YUHIKAKU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UHIKAKU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版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2005/ (日) 五百旗头真主编;

吴万虹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7-5012-3120-1

I. 新... II. ①五... ②吴... III. 外交史—日本—现代、
IV. D8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0613 号

图 字: 01—2006—2360 号

责任编辑 白小薇
特约编辑 林 昶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华审视觉

书 名 新版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2005)
Xinban Zhanhou Riben Waijiaoshi (1945—2005)

主 编 [日] 五百旗头真
吴万虹 译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1230 毫米 1/32 10%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120-1
ISBN 4-641-12258-X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

本书是日本第一本描述二战后日本外交的通史。序章部分概括了明治以后近代日本的外交传统及全书的构成，其他六章则以十年为一个阶段，详细论述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外交的发展。本书的作者除主编外，还汇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四位日本外交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他们是坂元一哉、田所昌幸、中西宽、村田晃嗣，分别负责执笔50年代至80年代的章节，其余部分由主编执笔。

1999年出版的第一版，内容涵盖至20世纪末期。其后不久，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亚洲，中国作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主席国，恢复了历史上中心国家的地位，而日中关系则因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走向恶化。为了将截至2005年末发生的重要事件收入书中，我们于2006年3月出版了新版。现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新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中文版在中国面世了。

在日本，截至本书第一版发行之前，真正意义上的战后日本外交史论著几近空白。所以，本书第一版面世以后，立即作为日本各大学的教材被广泛使用，并多次重印。同时，令全体执笔者喜出望外的是，作为优秀外交研究图书，本书荣获了1999年度吉田茂奖。因为在此之前，合著的教材获奖在日本还未曾有过先例。2001年，本书被翻译成韩语，在韩国出版。另外，英文版翻译也已基本完成，预计不久的将来可以在美国或英国出版。我希望，

本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关学者、有识之士以及青年学生的关注，成为国际交流与理解的良好基础。

我认为，能够请中国的读者朋友阅读此书，其意义尤为深远。因为对日本来说，对华关系不仅特别重要，坦率地说也比较困难。我非常希望通过本书，使与日本容易产生矛盾与摩擦的中国朋友能了解日本外交的真实面貌。

二

因为本书是通史，需要面面俱到，篇幅所限，作者并没有以日中关系为重点进行充分论述。因此，请允许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机会，简单回顾一下日中关系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日中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1）作为古代文明中心的中国与日本；（2）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和中国与日本；（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中关系。

（1）中国文明和日本

古代的中国文明不仅仅是东亚的中心文明，截至近代西方文明兴起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有影响力的文明。所有的伟大文明，犹如池塘中泛起的涟漪，其影响必然波及周围地区。当然，亚洲大陆东部海洋上的岛国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曾经反复接受了中国文明的洗礼。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在与中国文明的长期交往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方式。一方面，日本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中国文明的影响，还将学习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列为国家事业，派遣了大量的遣隋使、遣唐使，学习热情十分高涨。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又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通过学习外部优秀的文明，提高本国水平，培养独特的文化，维护国家的独立。这一方式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日本为岛国的缘故。

663年，日本的大和王朝曾向朝鲜半岛派遣2.7万人的军队，在与唐朝和新罗的联军作战的白村江之战中惨败。大和王朝认为唐朝与新罗的联军会进攻日本，因此加强了从九州至濑户内海的

防备，并将首都由奈良迁至琵琶湖畔的大津。此后，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明的精髓，并采用了中国式的法律及国家制度，于710年建立了新的首都平城京^①。日本充分利用海洋的天然屏障，一边加强向中国学习，一边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

除了元朝在13世纪曾经派船队企图征服日本之外，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考虑过要统治日本。另一方面，白村江之战以后，只有丰臣秀吉在16世纪企图染指亚洲大陆。然而，所有的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日本并没有成为统治东亚的中心国家，中国和日本也不曾对立。总之，截至现代西方文明进入亚洲之前，日本一方面从属于中国的文明圈，另一方面，又作为岛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

(2) 现代西方文明和中国与日本

经过产业革命洗礼后的现代西方文明，以机械动力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性文明。不幸的是，当19世纪前叶西方列强逼近东亚之际，中国清朝已步入衰退期。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呈现出200年兴盛期与100年衰退期交替出现的周期，清朝也不例外。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人坚持认为中国文明是最高境界，其他民族的文明与中国相比都是野蛮的。虽然在元代、清代时外族势力征服中国并统治了中国，但不久即被中国文明所同化。然而，西方列强与以往的外族势力完全不同，它们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和不断发展的产业力量，征服并统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中国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面对西方的挑战，以至一败涂地。虽然清朝内部也出现过“洋务派”等现代化改良路线，但清政府接受现代化改良路线并非易事，最终只以失败告终。

反观日本，情形则与中国相反。如前所述，日本不是中原大国，一直在努力向中国学习，同时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随着将学习中国文明的方式，巧妙运用于学习西方文明。当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时，民族自尊心高涨会产生强烈的排外民族主义。在同

^① 今奈良。——译者注

一时期，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日本则产生了幕府末期的攘夷运动。与幕府对抗的两个雄藩——萨摩与长州发动了反抗西方列强的攘夷战争。但是，无论 1863 年的萨英战争，还是翌年长州、四国联合舰队发动的下关战役，火力强大的西洋列强都在三天内以绝对性优势取得了胜利。值得注意的是，萨摩与长州此后居然改变了政策，停止了攘夷运动，将攘夷民族主义之势转向倒幕运动。日本在倒幕运动成功之后，又将民族主义之势转化为学习西方文明和推行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明治新政府诞生后的第四年，即 1871 年，新政府遣其大部要员，组成岩仓使节团在欧美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视察旅行，此举体现了日本全力推进现代化的学习热情。此后的日本连续提出教育改革等各种改革方案，建立了现代中央集权制国家。

近代以后，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道路，常常被批判为背叛亚洲。这一批判是不正确的。无论任何国家如果不向西洋学习，不谋求富强，就会沦为西洋列强的殖民地。这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宿命。我认为，不应该谴责日本迅速地实现了西洋模式的现代化。

问题在于，实现现代化以后的日本染指了亚洲。日本相继取得了日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避免了沦为殖民地，并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成为世界列强的一员。但是，日本并不希望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走与自己相同的道路。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之后，日本不能接受自己的既得权益受到周围国家民族主义觉醒的威胁。日本为了维持和加强既得权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 1915 年，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此举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由此爆发了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运动。1920 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统一中国进行北伐之际，日本政府向山东半岛出兵。日本的军事介入，致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向反对日本侵略。

当时的日本，存在着两大不同的外交路线：一条是在国际协调主义的前提下，坚持和平发展的币原外交；另一条是为了保护既得权益，不惜采取军事手段的田中外交。由于军部的支持，30 年代以后，田中外交成为主流。关东军发动的“9·18”事变后，

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空前强大，并逐步取代了政党的统治地位，日本对外采取军事行动变得更加容易。此后，日本陷入无止境的军事侵略。为了垄断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统治权，日本军队采取的行动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也引发了与英美两国的战争，最终导致日本帝国的灭亡。如今看来，当时日本的军事侵略实在是愚蠢之至。

（3）战后的日中关系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民族主义统一阵线的主导力量，其影响力开始大于国民党。日本军部最不愿看到的是亚洲的共产主义以及美国插手远东。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日本军部的军事行动却导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1945年8月，美军的空袭几乎摧毁了日本的主要城市，从而迫使日本投降并被占领。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以后的日中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冷战时期（1950—1971年）——中美对峙下的日中关系；②日中恢复邦交时期（1971—1989年）；③北京政治风波以后（1989年至今）——日中关系的波动。

①冷战时期（1950—1971年）——中美对峙下的日中关系

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对日本军事侵略的胜利，更进一步说，还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的胜利。一般而言，枪杆子产生的革命政权，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容易采取打破现状的外交。朝鲜战争对新中国而言，是第一次重大考验。

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是因为金日成得到了斯大林的援助而引发的。由于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的插手，朝鲜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值此朝鲜危急之际，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妄图从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越南三个方向进攻中国，为了阻止美国的行动，主张有必要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冷战在朝鲜半岛逐渐酿成热战，朝鲜战争实际上演化成成为中美之间的惨烈战争。

1950年2月，中苏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日美两国作为假想敌。另一方面，日美于1951年签订《日美安全

条约》，考虑到来自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美国决定让美军继续驻扎日本，保护日本的安全。冷战时期，中国属于东方阵营，日本属于西方阵营，日中两国在还没有及时处理有关战后遗留问题的情况下，就被分割为两个对立的世界。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在东方阵营内部以及亚非等第三世界中发言权增强，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与此相比，战败国日本在国际政治中持谨慎态度，更多地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中的 1951 年 1 月，美国杜勒斯特使因幡和谈判访日，他强烈要求吉田茂首相重整军备。然而，吉田首相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主张逐步发展只限于自卫目的的军备。吉田路线是在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下，专注经济恢复与经济增长，追求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路线。中国的读者或许不太了解，战后日本顶住了美国要求日本为西方阵营做出贡献正式重整军备的压力，通过自己的双手修筑了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些中国人容易以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旧印象看待当今的日本，做出“日本重新走向军国主义”的错误判断，并在国内外反复强调。事实上，日本的确存在像鸠山一郎、岸信介那样从传统的国家观出发，主张修改宪法、重整军备的政治人物，但 60 年代的各种民意调查显示，70%—80% 的日本国民深为侵略战争所懊悔，支持否定侵略战争的宪法，信奉以经济为中心的和平发展路线。从 1955 年到 1972 年，日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使得日本人更加相信，通过战争的方式强取豪夺提高生活水平并不可取，而通过技术革新和贸易的方式提高生活水平更为合理。

作为通商国家的日本，希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然而冷战下的国际政治不允许这样。根据 1951 年的旧金山和约，日本恢复独立后与西方盟主美国结为同盟。日美同盟为日本战后的安全与繁荣提供了保障。在朝鲜战争中，日本和美国持相同立场与中国为敌，并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根据政经分离的方式，日本在 1952 年以后与中国开展了少量的民间贸易往来。然而，由于 50 年代后期日中政治关系的恶化，

民间贸易也被迫中断。

建国初期的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灵活的路线。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周恩来总理于1954年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签署了载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时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的灵活性。然而，1957年以后，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进入整风和大跃进时期，开始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化。日中之间以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为导火索，民间贸易彻底中断。

三年自然灾害阻止了大跃进的脚步。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刘少奇与邓小平领导的经济调整时期。他们倡导“三自一包”政策，开办部分自由市场，发展经济。同一时期，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积极改善日中关系。根据LT贸易协定（根据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的协定，日中之间开展一定数量的贸易），重新恢复了日中经贸关系。

60年代后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们高举《毛主席语录》，批斗“反动权威”，刘少奇、邓小平失去了领导地位。越南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紧张，中苏也出现激烈的对立，毛泽东从战备上考虑，果断决定开展向内地转移重工业的“三线”建设。日中关系进入严冬。在日本，只有社会党与一部分民间人士继续与中国开展交流。

1969年发生的中苏珍宝岛军事冲突，使得中苏对立不再停留在口头上的相互攻击。据说，苏联曾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尼克松政府对此十分关注，开始尝试接近中国。为了确立对苏冷战中的优势地位，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与理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后，1971年7月，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消息。“越顶的中美接触”，给佐藤荣作政府与日本国民以极大冲击。

②日中恢复邦交时期（1971—1989年）

根据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中美首脑会谈记录，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不仅涉及了苏联的威胁，还就日本的潜在危险交换了意见，并达成谅解，认为日美安全条约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化

方面非常有效。周恩来总理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打算与佐藤政府之后的日本内阁建立邦交。中美之间最困难的就是台湾问题，美国虽然支持“一个中国”，但要求统一问题需要“和平解决”。周恩来总理在确认美军打算从台湾撤退后，同意“和平解决”（后来，美国国会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向美军撤退后的台湾提供武器援助，明确表示阻止武力统一的立场）。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率领大平正芳外相等访华，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断，中国放弃了对日索赔。日本停止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只限于民间层次的往来。在70年代这一时期，“苏联威胁”成为主题。从这一观点出发，中国强烈表示“反对霸权”，然而日本不希望与苏联关系恶化。70年代后期，苏联在世界各地大肆进行军事干预，美国放弃了对苏缓和的方针。美国卡特政府基于对苏封锁的观点，要求日美步调一致，进一步密切对华关系。1978年，福田赳夫内阁与中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福田重视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复出后结束“文化大革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福田首相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意义，概括为“吊桥变铁桥”。应该说，日本在西方社会中，是最早对邓小平路线表示重视并提供了大力支持与国家的国家。

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与中国签订了日中经济合作协定。由于1972年恢复日中邦交时，中国主动放弃了对日索赔，因此日本方面以经济合作方式作为报答。大平认为，日本给中国带来了战争的灾难，所以日本有责任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帮助。他还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向国际市场开放本国经济，谋求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对日本及东亚的稳定都是有益的。大平的这一立场，被日本的历届内阁所继承，从1980年开始的25年间，日本对华提供了无偿贷款3000亿日元、有偿贷款3万亿日元的经济援助。

在日本国民对华友好的感情升温下，中曾根康弘首相进一步扩大对华经济合作，与胡耀邦总书记一起制定了3000名青年访华与接收10万名留学生的计划，但是，胡总书记的路线受到了批

评。因此，尽管中曾根首相停止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但胡总书记还是于1987年辞职。

80年代，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达到世界顶峰，因此日美经济摩擦持续不断。东亚地区，日本、亚洲四小龙（NIEs）、东盟以及中国，陆续出现经济增长的连锁现象，被称为“东亚奇迹”。应该说，日本通过贸易、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等，发挥了主导作用。邓小平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建立了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在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下正在一步一步地迈向富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激烈的变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③北京政治风波以后（1989年至今）——日中关系的波动

1989年11月，柏林墙轰然坍塌，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体制接连瓦解。然而，中国没有出现类似现象。因为中国早在1978年以后就开始推行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能够改善国民生活，是强有力的政府，能够经受得住国际环境变化的考验。

根据邓小平的决策，中国在80年代积极推行改革，经济迅速增长。这种形势一方面受到置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骚动。慎重派与激进派，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剧烈变化时期都会出现。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国政府很快平息了事态。此后，中国进一步明确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谋求国家富强的既定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得以建立。

北京政治风波给重视人权和民主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带来不小的震动，它们纷纷采取对华经济制裁措施。在此情况下，日本最早解除对华经济制裁，并说服欧美国家，提出不要让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对此，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表示赞同。西欧国家起初因强调人权问题的重要性有所抵触，但不久后也表示赞同。在1990年7月举行的美国休斯敦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决定解除对华经济制裁。

当时美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日本占15%，为第二经济大国。一般而言，经济大国谋求成为政治大国是世界的普遍现象。日本的一系列自主外交表明，日本意欲成为

政治大国。中国政府邀请天皇访华，宫泽喜一内阁接受这一邀请，天皇于1992年成功访华。

但是，此后的日中关系却止步不前。1993年日本结束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历史，产生了非自民党的细川护熙政权，日本政坛进入了围绕“政治改革”的动荡时代。政治动荡的同时，日本经济因泡沫崩溃，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1994年的朝鲜核问题、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及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等危机接踵而至，日本人对冷战后的世界感到不安。

在中国，江泽民于1993年成为国家主席。他继承邓小平路线，同时强调爱国和国家统一。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领导人直接选举的时候，中国认为李登辉在搞台湾独立，因此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导弹演习，传递了“决不允许台湾独立”的政治信息。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驶往台海，表明“不能容忍武力统一”姿态。通过台海危机，中美两国再度确认了1972年的共识，即“一个中国”与“和平解决”的政策。

克服台海危机以后，1996年4月桥本龙太郎首相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联合宣言》，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日美安保体制。这一宣言既是针对1994年开始的朝核危机的应对措施，又有使日美安全条约成为包括台海危机在内的亚太安全装置的含义。中国认为，这个宣言是针对自己的，对此表示抗议。

翌年，中国开始改善对美关系。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均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通过“忽视日本”（Japan passing）的实际行动，表示要比同盟国日本更加重视中国的姿态，受到中国的欢迎，而令日本感到沮丧。

日中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为了推进日中关系向前发展，建议双方应超越过去的历史原因带来的感情对立，以现在与未来的日中两国国民的“共同利益”为中心，重新构筑两国关系。

两国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并拟定了33个合作项目，预定于1998年6月江主席访日之际签订，从而推进日中关系发展。但是，中国因为抗洪救灾，江主席的访日计划推迟了半年，结果，江主

席的访问时间恰好在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之后。其间，一连串的摩擦使此后的日中关系矛盾不断激化。如果江主席能够按照预定日程访日，如果小渊惠三首相接受了中国方面的要求为侵略战争作书面道歉，如果江主席没有在日本接连发表要日本正确认识历史的讲演，日中关系也许不至于恶化到如此地步。

在历史问题方面，日本当时已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取得了和解。在与韩国之间，也与此前访日的金大中总统达成历史性的和解。日本与中国之间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却出现逆转。我们应该看到，现实的友好关系可以化解过去的历史纠葛，同样，一时的对立也会激化过去的仇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唤醒了中国人民痛苦的记忆，日中关系愈加恶化，以致贻误了眼前的共同利益。

日中两国的关系恶化，引发了2005年4月的中国涉日游行，此后，中国政府质疑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认为，这都是应该避免的行为。

中国以“9·11”恐怖事件后的反恐斗争为契机，积极推进与美国的合作。伊拉克战争以后，中国接受美国的请求，作为主席国主持召开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恢复了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失去的东亚中心国家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与东亚中心国家中国的关系恶化，对日本来说，意味着将在东亚的国际关系中被边缘化。毋庸置疑，这将有损日本的国家利益。同时，从中国角度来说，也不愿看到对日关系出现恶化。应该说，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先进的日本产业技术还是大有利用价值的。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放弃引进在成本和安全方面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日本新干线，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另外，日本的能源效率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十倍，如果中国能够引进日本的技术，把能源效率提高两倍，中国就不需要从世界各地购买大量能源。公害与环境问题也同样如此。此外，还应该看到，在政治上，涉日游行还容易发展成为反政府的运动，有导致意外后果的危险。总之，日中关系的恶化，不仅不利于日本，同时也不利于中国。

正因为如此，在小泉政府结束、安倍晋三政府诞生之际，两国政府迅速举行首脑会谈，并提出建立双赢关系。虽然安倍首相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态度依旧暧昧，然而我认为，日中双方均已认识到，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中国方面才不再一味要求日方承诺不再参拜，并同意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我本人作为日中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的委员，主张日本应该对过去的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同时，我还认为，中国方面应该对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给予肯定。这是两国建立健全的战略关系不可缺少的基础。在 2006 年 10 月的日中首脑会谈中，胡锦涛主席充分肯定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对此我表示高度赞赏。

日中两国能够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吗？日本属于海洋国家，中国属于大陆国家，类型截然不同。两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迎来了强强并立的时期。日中两国应该在竞争中建立合作关系，避免效仿罗马与伽太基“两雄不能并立”的你死我活之争。为了未来的东亚利益，日中两国还应该形成互补关系，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将视野由东亚扩大到亚太地区，我认为，围绕重大问题，日美中三国应该通过战略对话，制定相关框架。亚太地区存在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十日韩等各式各样的多边会议，如果日美中不能就有关主要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谅解，那么各种多边会议就只会徒有虚名。

未来的日本外交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还应该坚持日中协商，使日美、日中关系成为两个基轴。与日本相比，中国外交还必须肩负文明史的重任。中国必须认识到，中国正在崛起。历史教育人们，大国崛起之际，维持现有秩序国家与挑战现有秩序国家之间容易引发争端。21 世纪的中国，会不会重蹈 20 世纪德国与日本的覆辙？历史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中国会成为怎样的国家？或许中国在未来的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既非前者，又非后者，而将具有其独创之道。

发展起来的中国，应该避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继续保持和平发展路线，与美国一起维护亚太秩序。对于中国来说，在今

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建立与维持日美中合作框架，不失为明智之举。

真正称职的政治家既要满足国内的政治需求，同时又必须拥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做出准确的全局判断。我真诚地希望，日中两国从“开放的国家利益”出发，建立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共同造福于 21 世纪的国际社会，赢得世界的尊重。

三

无论对本书的作者还是中国的读者来说，由吴万虹博士担任本书的中文版翻译工作，都是值得庆幸的。吴万虹女士曾在日本神户大学研究生院留学，多次参加我主持的研究生讨论课。在我的研究生中，有来自美国、俄罗斯、中国、韩国等国家的众多留学生。其中，吴万虹女士无疑是发言最为踊跃的一位。她日语娴熟，擅长辩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吴万虹女士以战争遗华日本人为题目，撰写了具有独创性的博士论文，获得很高的评价，并由日本的出版社正式出版。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工作后，就开始着手翻译本书。不仅如此，吴万虹女士还与以外交领域见长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进行多方沟通，并申请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翻译及出版赞助，使本书得以在中国面世。对此，我深表谢意。吴万虹女士曾向我提及，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同人的很多帮助，在此我也向他们深表谢意。

我还要向为中文版提供赞助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及北京事务所各位人士，对全面支持中文版的出版并向该基金会大力推荐的渡边昭夫、国分良成、田中明彦、添谷芳秀以及中国方面的金熙德等诸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五百旗头真

2006 年 12 月 24 日

新版序

本书第一版发行于 20 世纪末，是日本关于战后日本外交历史的第一本著作。非常幸运的是，本书被日本各大学选作教材。令全体作者喜出望外的是，本书打破惯例，作为合著的通史被授予 1999 年度吉田茂奖。

第一版出版时，我们认为它较好地总结了截至 20 世纪末的日本外交。进入 21 世纪后，发生了“9·11”恐怖事件，这不仅给国际环境带来新的冲击，也使小泉内阁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但 21 世纪最初的五年已匆匆度过。因此，我们考虑在基本认清小泉外交的本质及其未来走向之际，出版新版。

新版的特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涵盖了截止到 2005 年底的世界和日本外交。将第一版关于 90 年代的“结论 冷战后的日本外交”的部分，在新版改为“第 6 章 冷战后的日本外交”，涵盖了从 1990 年至 2005 年的 15 年日本外交史。

第二，删除第一版中的“结束语 21 世纪的课题”，新增“结论 如何评价战后日本外交”。结论根据各章节论述的轨迹，全面系统地重新审视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不同时期。同时，还纳入各章节难以单独处理的有关国内政治的观点，并对 60 年来的日本外交进行总结。希望读者能够将各章节的分论与结论的总论结合起来，全面考察日本外交。

第三，第一版发行后，有关的外交文件不断解密，相关人员的回忆录、外交史研究的进展也相当迅速。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对全部章节均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改，当然也补充了部分参考